为信仰而歌

□李硕儒

岁月更迭，我和王朝柱经常掐指计算，从相识相知到如今我们已经结识24年了。是《李大钊》一书使我们结下的这可贵之缘。那时，我们正当盛年；那时，国门初开，西风东渐，随着思想解放的大潮，文化思想界流派纷起；文学艺术界无不想求新求变，模仿、舶来、横移，奇招百出；技法上，意识流、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你方唱罢我登场；内容上，解构传统、解构观念，于是出现了重塑信仰、重塑观念、重塑审美的风潮。就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中国青年出版社当年的责任编辑赵燕玲拿来了王朝柱抄写得工工整整的72万字的《李大钊》手稿，我细细品读，他既未追摹风行一时的新流派新手法，也丝毫不受喧闹一时的新思潮的影响，而是以严格的唯物史观观人论世，坚守史传文学以史写人、以人绘史的手法，怀着无限敬畏之心，从李大钊东渡日本求学起笔，循着他探求救国之路的足迹，绘声绘色地写出了李大钊在日本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向国内寄发《警告全国父老书》并从此初步接受马列主义。归国后，一面在北大任教，一面与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每周评论》，并协助北大学生创办《国民》和《新潮》，借以宣传苏俄革命和马列主义、抨击旧礼教旧道德，从而举起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催生并领导了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继而，自1920年初在北京先后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直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再到组织发动开滦大罢工和二七大罢工，他作为时代先锋和党的领导人的伟大身影始终站在历史的潮头；1922年至1924年，他受党的委托，率先与孙中山先生谈判，开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并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领导工作，正当他参与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斗争如火如荼的时候，却惨遭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逮捕并英勇就义……读着这一幕幕如身临其境的历史，我们似乎始终伴在李大钊身边，忽而为那暗夜如磐的祖国命运而忧而哭，忽而与留日学生、北大学生一起激扬文字、誓死抗争；忽而同开滦矿工、武汉铁路工人一起罢工，忽而与孙中山筹谋联合革命、为祖国开创一个新世界……

我以为，每一部成功作品、特别是史传文学作品的诞生，都是既凝聚着作者长期的学术积累，又有作者切身的情感体验。在“文革”中，王朝柱被送往农场劳改了6年。他心如止水，带着问询现实、叩问历史的求索之心，除了日常劳动，一心扑向哲学、历史、文学，尤其将近现代史作为他重点研习的课目。心之所至，他竟孜孜30余年弃乐从文，与李大钊虽时代不同、对象不同，求索之心、遭际境遇却颇有相似之处，加之他多年的学养准备，才成就了他在《李大钊》一书中那宏大高远的立意、严谨大气的结构、醺醺欲醉的时代氛围、呼之欲出的艺术形象。更加重要的是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凡了解王朝柱的朋友都众口一词地认为，他是一位不虚饰、不掩藏、不管风吹浪打都坚定不移地追随这个崇高信仰的后来人。有共同信仰的人才能走到一起，有共同信仰的人才能切实体味并能忠实描摹出那些先贤圣哲的胸襟抱负、理论学说及至情感波澜。这可以《李大钊》一书的思想艺术成就作证，更可以王朝柱至今已出版的42部史传文学、18部电视连续剧、4部电影中塑造的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一个个伟人的艺术形象的成功作证。

血管里流出的都是血。为信仰而歌、以学问作基础的作家才能常写不衰。

王朝柱现象的启示

□雷 达

提起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人们常常谈到王朝柱，认为他在传记文学和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两个大的领域中都取得了突出成绩。他的历史眼光、写作路径、艺术经验值得总结，且有人将之称为“王朝柱现象”。王朝柱采用的基本是传统的方法、现实主义的叙述，其衡人断史的眼光，基本遵循的是“正史”的规范，即体现的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尺度，属于标准的主旋律创作；然而他的作品却并无陈旧之感。他的几部主要电视剧的收视率都甚为可观。一方面，他的创作无疑是得到政府大力扶持的，但另一方面，假如没有来自广大观众的首肯，没有自身的收视率、影响力，恐怕也无法在竞争激烈的电视剧市场上站住脚跟。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近些年来新生力量崛起，新的党史军史研究者和青年才俊大量涌现，像王朝柱这样接近老年的、自学成材的、属于业余的史学学者、作家，却还能受到人民群众欢迎，还为社会所需要，也是一个奇迹。这就促使我们思考：王朝柱成功的原因何在，他的作品魅力何在，他何以仍能为读者和观众所喜欢？

启示之一，是天道酬勤，厚积薄发。读破万卷书，注意吸收历史，特别是党史军史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化入作品，是王朝柱成功的一大原因。我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认识了王朝柱，对他早期的写作生活有所了解，还为他的第一部传记文学《李大钊》写过书评。我第一次到他家，被满屋子历史书籍和文史资料给镇住了，一大间屋里，只有书桌椅子处有一点小空间，他每天就埋首于此。人简直要被书压迫得窒息了。他说他一辈子就是对历史感兴趣，尤其对近现代史感兴趣。是啊，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我感慨地对他说，如此刻苦，那谁都盖不住你，早晚要出大名。这话王朝柱记了好多年，现在还经常说起。真是功夫不负苦心人，在几十年时间里，王朝柱之所以能不断拿出或是传记文学或是电视剧本，而没有枯竭相，后劲十足，与他多年来勤奋刻苦的读史积累是分不开的。

启示之二，以厚实的史料基础取胜，以深刻的分析史料见长，他对大量历史细节和史实的占有，显示了扎实的基本功，为许多党史题材写作者所不及。王朝柱不以观念的新锐炫目，却能提供更为厚实的历史真实，能以更大的可信性和说服力征服观众，获得共鸣。当然，这些年来历史界、党史界新论迭出，翻案文章不少，王朝柱是很注意吸收的。例如在《长征》中写遵义会议的过程就融入不少新材料。但我以为，王朝柱作品的魅力最主要的还是来自扎实的史料——生活本身，他能真实地写出历史事实本身的强大的内在逻辑力量，这是仅靠观念化的写作无法相比的。从治史角度看，王朝柱擅长国共两党历史的研究，对蒋介石及其密友，对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的研究都很深入，这才保证了他日后写全景式重大题材电视剧的资源储备。

从《政坛败将——史迪威在中国战区实录》一书也可看出，他对蒋介石的历史和抗战史是下过功夫的，实际上该书是蒋介石史的延伸，以至写起史迪威来也能游刃有余。该书通过史迪威其人的战功、政见，以及与蒋介石的矛盾，抓住他的悲剧这条主线，再现了中、美、英三国元首及其军政幕僚是如何进行政治角逐的，从而再现了二战的广阔背景。

启示之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根、以人为魂、以人带史，所有作品都建筑在对重要历史人物的业绩、人格、个性的深入了解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在他眼里，百年历史，主要框架就是众多历史人物构成的。王朝柱早期以传记文学创作为主，善于以人带史。新世纪以来，他逐渐尝试驾驭全景式的宏大叙事，并取得经验，既有伟人性格的魅力，也有群星灿烂的壮阔，以《长征》《延安颂》《解放》等为代表的一批大制作，均给观众带来了雄浑的视觉语言冲击。

为宏阔历史注入细节

□阎晶明

王朝柱以描写大历史、塑造大人物著称于文学界特别是影视界。他的八卷本文集精选近日出版，更加集中地展现了这位勤奋笔耕的作家创作出的丰硕成果。在这八卷本中，我特别挑选了《周恩来在上海》一书。原因有二：一是这部著作所写的历史时期框定在1927年至1931年之间，这期间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初期，也是中国革命的低潮时期，中共面临着同国民党进行斗争的残酷形势，同时党内在思想路线方面也存在很多复杂情形。二是周恩来既是中共革命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但在这一时期还不是最核心地位的人物。如何在这样一种特殊局面中为党工作，这是很有戏剧性和紧张感的。

《周恩来在上海》满足了我的这样一种阅读期待。作品全面展现了周恩来在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历史时期，冒着被敌人包围、同时在党的内部又充满复杂斗争形势下的各种经历。作品显示出以下几个写作特点：

掌握大量史实材料，把人物放到大的历史背景中去描写和塑造。为了写好人物和故事，王朝柱阅读和掌握了大量史料，大量爬梳相关人物的传记作品。集多家所说，整理出自己的思路和观点。对周恩来经历的每一件大事，尤其是牵涉到党内众多人物的历史事件，既有客观陈述，又能够抓住重点，形成自己的看法。所述故事真实性、生动性极强。

以正史的态度写人和事，以坚定的历史观和政治态度评价人和事。在今天这样一个多元化的写作境况中，作者持有怎样的历史观点和态度，对作品所写人物和事件的评价起着致命的作用。王朝柱始终以塑造共产党人形象作为出发点和归宿。不是刻意放弃立场“零度叙事”，也不刻意拔高人物的形象。没有价值立场容易在评判上迟疑和乱向，立场过分突出又会损伤故事的生动程度。作品在这方面掌握分寸得当，相得益彰。具有可信度，同时也具有可读性。

作品在后半部分描述顾顺章、向忠发等人被捕进而叛变革命的过程，写出了事件的深度背景，刻画了人物的复杂心理，把国共两党在这一特殊历史角力、胶着的情形和残酷的斗争形势、紧张的斗争情形以丰富的故事细节、简洁的文学语言进行了描写。特别是针对顾、向二人被捕的过程、叛变的原因以及对党和革命造成的直接的、巨大的损害，作了非常详细而令人信服的描写，进而追溯和指出他们二人参加革命动机的脆弱和投机。在这些描写中，作品突出塑造了周恩来既具有高超的智慧、敏锐的观察、果断的决策，为保全革命队伍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同时也塑造了他稳重淡定、遇事善于判断并能够从大局出发的优秀品格。在塑造革命人物方面，具有独特的风格和特点。

通读全书，特别感受到王朝柱是一位把严谨的治学态度、鲜明的政治立场、丰沛的写作激情、明晰的表述语言结合于一体的创作者。对待历史人物事件不作刻意的拔高和贬低，大是大非面前又具有明确的观点和立场，对所写历史具有丰富的史料掌握，写作过程中又能够全身心投入。这种写作姿态，对今天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和纪实文学创作，都是具有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的。

1月26日，王朝柱文学创作40年暨《王朝柱精选文集》出版研讨会在京举行。铁凝、何建明致信祝贺。陈建功、高洪波、左中一、王巨才、李准、仲呈祥、蒋子龙、白庚胜、李敬泽、夏潮、汤恒、郑伯农、柳萌等专家学者对王朝柱40年来取得的创作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并就其作品的艺术特色、艺术思想和艺术价值进行了深入的研讨。现刊发部分与会专家的发言摘要，以飨读者。

——编 者

一个奸雄形象激活了一部日本侵华史

□范咏戈

《谍海奸雄——土肥原贤二秘录》在王朝柱的文学世界里不属于“主旋律”，应属于“多样化”的一部。然而正是这部作品，对当下十分困难的中日关系提供了一种镜鉴作用，给读者以最现实的思索和启示。土肥原贤二——这个至今仍被供奉在靖国神社、不断受到日本朝野参拜的二战甲级战犯，虽在1948年被远东军事法庭处以绞刑，其幽灵仍在游荡，其阴魂不时“附身”，王朝柱在若干年前写的这部关于土肥原贤二的“秘录”，体现出对日本侵略题材选择、判断的正确。这本书对于愿意了解日本军国主义罪恶渊薮和前生今世的读者具有言近旨远的历史认知价值。

从王朝柱的历史题材文学创作中，我们感受到那种可贵的写作诚意和非凡的题材驾驭能力。一个满足于现世享受而患上历史健忘症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出于一种责任，王朝柱选择了历史题材创作。他笔下的历史是被鲜明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和视角照亮的第二现实。可以说，一部《谍海奸雄》激活了一部侵华史。何以能够如此？是因为这部书在大节关目上凸现了土肥原不是一个一般的间谍，而是一个战略间谍。这个“中国通”，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事变”发生。在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土肥原均扮演了关键角色，还都有一个堂而皇之的说词，即是为了大东亚共存共荣，说白了就是日本要吞掉满蒙乃至整个中国甚至东南亚。《谍海奸雄》在恢弘的历史框架下对土肥原这个人物进行了笔触细致的刻画。作为一个侵华恶魔，他残暴阴险，多谋善断，但并非一介武夫。他不仅会讲流利的中国话，会欣赏中国字画，还会哼京剧、唱民歌。书中的土肥原已不是史载的土肥原，而是一个艺术形象，一个集狂热的军国主义精神和“战略性”间谍眼光、手段于一身的崭新艺术形象。

《谍海奸雄》之所以超越了一般的历史演义和通俗读物而具文学价值，是因为作者恪守了现代传记文学开创者朱东润的14字原则：“有来历，有证据，不忌繁琐，不事颂扬”。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有来历，有证据”。为做到有来历有证据，作者广泛占有历史资料，所有存疑之处均引用权威人士的自传或回忆以及远东军事法庭当年审判土肥原时的审判书作为佐证。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是“戏说”而是“正说”。同时，也因为作者的历史题材创作遵循了“以文运史”、“以人统事”、“以今述古”的原则。这里的“文”是文学，包括文学的叙述、文学的氛围、文学意义上的人物形象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摒弃了文学技巧在小众中“爆炸”的路数而以传统的文学手段收大众传播之效。“以人统事”则是以土肥原这一个人带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部日本侵华史和当时中国复杂的政局时局，人主事，事补人。“以今述古”则是因为作者对日本侵华题材的认识、开掘有一种前瞻性眼光，使读者收到时读时新之效，无限制地延长了作品的生命力。由于这些遵循，又因一个人的创作带活了一个体裁——纪实文学，使它气象万千、活力四射。

让精神的力量光芒永存

□梁鸿鹰

精神的力量是永恒的，伟大的精神可以成功跨越时空的阻隔，以可贵的思想价值光芒，永远映照世界与未来，优秀文学作品所蕴含的精神力量，开辟着清晰可辨的轨道，引领着人们的前行，王朝柱的作品无疑具有这种魅力。一位外国评论家在谈到长篇小说的阅读时曾经说过：“我们想在小说中遇见的如果不是我们的朋友和我们自己，也是某种可辨识的社会现实，不管是当代的还是历史的社会现实。”王朝柱的长篇小说《囚徒的长征》让读者遇见自己灵魂的朋友，并与这些伟大灵魂对话，去领悟长征与今天的联系，反观自己的人生。长征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可辨识性，在于它与我们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长征精神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一部分，完成这一壮举的红军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不过《囚徒的长征》所描写的历史细部，与我们所熟知的历史不同，作品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长征途中发生在那些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们身上的一些后人难以想象的磨难和尴尬——在小说里，作为革命者的主人公是遭到怀疑、陷害、打击的人，原来长征途中的革命者与革命者之间有着严重的分歧，他们一边对付着敌人的围追堵截，忍受着饥寒伤痛，一边还要应付着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剧烈冲撞，如各执一词的争执、令人痛心的自相伤害等。但尽管如此，在这个处处都有激流险滩、革命洪流如大浪淘沙的伟大征途中，革命者无论遭逢怎样的艰难，仍然怀有坚定的革命信仰，以刚健向上、锐不可当的精神力量鼓舞着我们。

《囚徒的长征》的独特性在于既没有正面切入长征从决策到推进的整个运作过程，也没有写敌我双方高层的较量。作家从普通战士、长征具体参与者和经历者的角度展开小说叙事，着力描写普通人的内心世界、精神律动，努力写出极端状态下的人性挣扎，显示了很强的艺术驾驭能力。作家以现实主义笔法，浓墨重彩地表现了这些普通革命者经历的炼狱般的艰难，特别是刻画了几位女性遭受的精神肉体磨难和痛苦挣扎，比如革命者姚秀芝莫名其妙地戴着“托派”的帽子走上长征之路，颠沛流离，受尽折磨，身心疲惫，但革命信念依然不减，相反更加坚定。而从家乡逃脱出来且有着身世、婚姻、家庭等等悲苦遭遇的苦妹子、十岁红、幺妹子等也受到了来自队伍内部的不公正待遇，渴望光明成为她们的梦想。这些革命者带着对“火”和“光”的执著追求，向着温暖、向着希望，在长征路上奉献着自己的一切，同时也以自己正直、坚强的光芒照耀着周围的人，照耀着震惊世界的征程。

以纪实风格见长的作家在该书中展现了写作艺术灵动与飘逸的一面，王朝柱瞄准伟大长征鲜为人知的那些侧面，对一个人们反复写过的领域进行了深入挖掘，揭示出壮阔征途上革命者人性的复杂，显然充分调动了长期的思想积累与艺术积淀。他创作这部作品时正值各种思潮纷起，形式探索不一而足，但他头脑清醒、落笔沉稳，始终保持着现实主义的清正与纯熟。他在自己笔下从不吝惜对中国人美德和品格的赞颂，不吝惜对美好理想的讴歌，他笔下的人物可能有缺点和缺陷，但大多讲情义、重然诺、轻生死。作者向来把自己的创作与国家、民族利益联系在一起，致力于用大情大义为中华民族树碑立传，致力于用艺术的良心和尊严维护中国人的尊严与中华民族历史的尊严，以《囚徒的长征》等为代表的这些讲求艺术品格、弘扬革命精神的作品我们永远需要。

在诗与史的结合上打造辉煌史诗

□陈先义

王朝柱八卷本的精选文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这不仅对于王朝柱本人，对于中国文学也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因为这八卷本精选文集的出版，不仅对作者而言是一个时期以来文学创作的总结，也是对中国史传类文学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与影视创作成功结合的回顾。在这套文集中，我想就《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谈点读后感想。

作为洋洋洒洒70余万字的大作，这部书以长征为表现题材，这需要一种大气魄、大胸怀，因为长征作为人类征战史上最伟大的壮举之一，确实值得大书特书，它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事件，都可以产生文学的鸿篇巨制。而这些事件，都以小说、影视、戏剧等不同形式为中国老百姓耳熟能详。作者要对这样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题材以一本书的形式来进行全景式表现，就必须要给读者以新的启示和感受，就要出新出奇出彩。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要实现诗与史的最好结合。

《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最值得总结的创作经验，是作者很好把握了历史与文学、诗与史的完美统一。首先说史，长征作为人类征战史的奇迹，是战争史上的伟大壮举，表现好这段历史，就要求作者必须具备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以此来审视和表现这段历史。其次，既然给作品冠以史传类文学的属性，就应该有文学和艺术的表现。在这两者的结合上，作者寻找到了一个最佳的点，这有书中大量的生活故事和情节细节可以佐证。

第二，王朝柱不仅是驾驭大题材的高手，而且也是善于写矛盾的高手。一部文学作品回避矛盾，作品就会失去它的魅力所在。《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的魅力，就在于作者出神入化、游刃有余地表现了国共两党以及我党高层内部斗争等纷繁复杂的多种矛盾。诚如作者本人总结：历史人物越大，可供虚构的内容越少；历史人物越近，可供虚构的选择越少；历史人物若有争议，便不可能允许虚构。这部作品在写矛盾方面之所以独具特色、成为亮点，就在于作者以极大的毅力，沉于书斋案头，寻访名人贤达，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他从大量历史史料中披沙拣金，找出了最具光彩的部分，总结出符合历史的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来。

第三，《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不仅是一部辉煌史诗，同时也是一部英雄主义和理想精神的颂歌。近几年来，关于长征的研究，不论国内或者西方，有一种错误的导向，即长征是人类挑战生命极限的奇迹，企图以此来消解长征的政治意义和理想色彩，把长征精神仅仅局限在对人的生理对苦难承受力的研究上。该书也写了红军经历的极其罕见的苦难，写了饥饿、寒冷，写了疾病伤亡，但在对战胜苦难的描写中，无时无刻不高扬着理想信仰的旗帜，浓墨重彩地表现了红军英雄们对理想的向往和对信仰的坚守。而这样一种坚守，对今天的文学创作来说，显得特别重要。

谈到自己的史传类创作，王朝柱有一种期待，希望有一天，人们会把他的作品当作当代版的《三国演义》来看。我们相信，这些记述20世纪中国革命的系列作品，一定会在中国文学历史上以独具的特色散发着永久的艺术魅力。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英雄暮年壮心不已，在王朝柱即将迈向74岁人生的时候，我们衷心希望他的创作之树常青，为中国文学作出更大贡献。

与伟大时代相称的文学形象

□木 弓

在当代文学中，作家王朝柱可以称之为塑造毛泽东文学形象的第一人。他用几十年的努力，研读中国革命的历史，熟悉在这个伟大的历史变革中的许许多多政治人物，写了大量这一题材的文学作品，在社会上反响很大，也在文学上取得很大的成就。其中，伟人毛泽东的文学形象塑造最为感人、最为成功。长篇纪实文学《开国领袖毛泽东》就是他探索创新的代表性作品。

《开国领袖毛泽东》真实可感地反映了新中国建立前后波澜壮阔的历史现实，围绕着中国两种命运的大决战的历史重要关头，全方位地描写了国共两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以及精神上的斗争较量，突出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前途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不怕牺牲，浴血奋战，推翻蒋家王朝，建立新的国家的理想、意志和信念，成功塑造了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毛泽东的文学形象。这是一部气势宏大、格局开阔、境界高远、能够与我们伟大时代相称的优秀作品。

毛泽东文学形象的成功塑造是这部作品最实在也是最重要的思想艺术贡献。今天的文学作品中，毛泽东的形象并不鲜见。但是，能够称之为艺术上成功的却为数不多。而王朝柱的探索和努力，使他成为能够写活毛泽东、写深毛泽东、写出毛泽东之魂的为数不多的作家之一。

作家在中国历史的伟大进程中展现了中国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毛泽东的历史必然性，写出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发展的伟大精神和伟大实践，也写出了中国共产党人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凝聚力和自信力，通过毛泽东的形象塑造写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时代风貌，让人信服地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改变中国人民的苦难命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真理。毛泽东这个伟人形象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命运的决战中挺立起来、丰满起来的。

作家在现实复杂的关系中塑造出一个具有时代胆略智慧的高瞻远瞩的政治家的形象，在突出毛泽东的个性魅力的同时铸造了民族的大智慧，展现了一个时代英雄的性格。在从一个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历史时期，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要面对新的风险，经受新的考验。作品真实地描写了当时严峻艰难而错综复杂的现实矛盾，写出了党从乡村走向城市的“赶考”心态，写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团结社会各阶层力量献计献策、共同破解时代难题、建设新中国的智慧。在这些关系中，毛泽东的形象绽放出了夺目的光芒。

作家在各种历史人物的比较中突出了毛泽东的道德品质和个人魅力，增加了形象的文学分量。作家在着力塑造毛泽东形象时，也着力刻画其他重要历史人物的性格，如对蒋介石、李宗仁的描写。非常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是雄才大略的中国政治家，但两个人的性格品质完全不同。作品写出蒋介石与李宗仁在解放军的炮声中，在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情况下，还在进行争权夺利的派系斗争。所以，国民党难逃失败的命运。

关于王朝柱创作的经验，大有深入研究的必要。不过，我们应当注意王朝柱笔下的毛泽东文学形象的重要意义。从文学上捍卫毛泽东，正确还原真实的毛泽东是我们的责任，意义重大。塑造好毛泽东的文学形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的建设有着重大的意义。中国需要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文学需要建立自己的话语权。因此，对自己民族英雄形象的塑造就是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获得话语权的重要途径之一。